

凭窗读史



1963年，和平门小学学生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 冯文冈 摄



2018年，国家博物馆举行“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庞铮铮 摄

盛世国博

暑期到来，中国国家博物馆进入旺季，成千上万的游客慕名前往参观。上世纪50年代，国博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只用了293天便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进入新世纪后，两馆合二为一，并进行了改扩建，成为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如今，国博里的“看家宝”化身文创产品，在文旅热潮中火出了圈。

293天建成“历博”和“革博”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2年，当时民国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筹办并直接管理的国家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随后成立。北京历史博物馆和中央革命博物馆就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也被北京人亲切地称为“历博”和“革博”。

1958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于1958年9月开始设计、10月动工兴建。之前，我国建筑学界曾提出80多种设计方案，经过几十次辩论会的热烈讨论，最后选择了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合作的方案，同时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作了补充和改进。施工过程中，全国18个省市的1500多名工人给予了支援，各地工厂积极承担了博物馆的500多项加工订货任务，首都不少职工、干部、学生还会在假日里主动参加公益劳动。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建成，从开工到竣工，只用了293天。两个博物馆看上去是一个整体：在两人来高的花岗岩台阶上，有24根大柱子并列排开，柱顶檐口下边正中间，有一个由许多面红旗簇拥着一个红星所组成的旗徽。两馆总面积约6.5万平方米，展厅一层有9米多高，是普通住宅楼每层高度3倍左右。

建成当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就进行了“中国通史陈列”公开预展。全馆按照社会发展时期分为原始社会馆、奴隶社会馆和封建社会馆，每馆按照发展阶段和朝代陈列，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196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开馆，这里陈列的珍贵文物，记录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

多种大型展览观者络绎不绝

改革开放后，历博和革博成为各种大型展览的重要举办地。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中共中央马思列斯著作编译局等单位主办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中国建筑博物馆联合展出的《马克思及其亲属、战友和有关历史背景的照片、图片、文献资料、绘画、实物等400余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况。展览史料珍贵翔实，前去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

1984年，文化部文物局和历博共同筹办了全国精选文物展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性大型展览，展出了25个省、市、自治区400多个单位从废旧物资中挑选出的1300多件文物，都是冶炼、物资回收、造纸、银行等部门与文物部门通力合作抢救出来的，包括周恩来等同志发动学生抵制日货而被拘留的《警厅拘留记》的手稿及照片、明代画家沈周和八大山人朱耷的画等。“在废旧物资中，竟然有这么宝贝！”看到这些，不少观众感叹。

1992年，历博和中国集邮总公司、中国邮票博物馆共同举办了《邮票与文物展》。这次展览有反映中国历史题材的邮票500余枚，与邮票图案相对应的青铜器、货币、绘画等珍贵文物及图片百余件。展览吸引了众多国内外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外景。 高宏 摄

观众，尤其令集邮爱好者流连忘返。

1994年，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举办的邓小平大型图片展览在革博隆重开幕。此次展览由“在革命战争年代”“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生活情趣”“小平，您好”六部分组成，共展出图片资料近400张，生动地展示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和国际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代伟人的气魄和风采。展览举办了25天，参观人数突破13万人，盛况空前。

那个年代，历博和革博因为常有多种大型陈列展览，成为北京市民了解历史、温故知新的重要去处。

成为世界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历博和革博建成后，一直代行着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职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建筑逐渐不适应新要求，比如，展厅过高过大、展线过长；基础设施陈旧，气、电、水等管线严重老化；库房严重不足。文物保护与展示条件与应有的基本条件相去甚远，大量馆藏珍贵文物不能妥善保管。

1996年，建设国家博物馆被列入国家重点文化建设工程。2002年，中央编制办公室批准在历博和革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3年2月2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暨挂牌仪式举行。2004年，国博宣布改扩建方案全球招标。经过半年多评选，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与德国GMP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联合设计的4号方案脱颖而出，成为中标方案。后来，方案又进行了多次修改才最终确定。

2007年3月，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根据最终敲定的方案，老馆西、南、北三面整体保留，进行加固改造和维修，在保留国博广场前提下，老馆西侧向前推进约10余米，新馆部分则镶嵌在老馆中间并向东扩建。

经过两年半改扩建，2009年9月23日，国家博物馆部分露脸。这次先期开放的部分有1万多平方米，是改扩建后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两天后，《复兴之路》展览在新国博拉开序幕，1150余件珍贵文物铺陈开来，讲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走向复兴的卓绝历程。

2011年，新国博全面揭开盖头，开始试运营。当时，中国古代佛像艺术展、中国古代瓷器艺术展、李可染艺术展、黄胄艺术展等展览携手开幕，加上此前已经开放的北部展区，新国博南北区域实现了联手开放，其场馆规模和硬件设施都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博物馆的水平。

一年后，新国博正式开馆。新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是原来老馆面积的3倍，展览面积近7万平方米，共48个展厅，成为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馆藏总数增至约120万件，其中，既有久负盛名的后母戊鼎、大孟鼎、虢季子白盘、四羊方尊……也有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物：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简要论文手稿（中、英文）；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我国奥运实现“零的突破”获得的金牌；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主席宣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使用的木槌；杨利伟在“神舟”五号上穿过的航天服和使用过的生物救生包以及“神舟”五号的返回舱等。

“看家宝”化身文创产品火出圈

近年来，国博让一件件“看家宝”化身文创产品，在文旅热潮中火出了圈。

说唱俑造型的U盘、彩陶系列的胶带……2016年，国博天猫旗舰店正式运营，110种国博纪念品陆续在网店亮相。值得一提的是，国博独创的“指触魔卡”系列明信片通过手机应用让文物“活起来”，人们可以多角度观察它们的细节。

2024年，国博利用数字化手段推出的50余款古文字文创上新，销售额超过2600万元。其中，主题为“博物馆里有条龙”的龙年日历，解读和文物有关的汉字，上市不久便销售一空。

2025年，国家博物馆以明孝端皇后凤冠为灵感设计的凤冠冰箱贴，历经8个月零6天，销量突破100万件，被众多网友誉为文创“天花板”。外地游客为了买到这个凤冠冰箱贴，甚至会提前做一份“抢”文创攻略。

“凤冠模式”撬动了文创消费新市场。今年，国博为马年春节量身打造的“黑马”系列文创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必选品。“李静训和她的时代”开展后，43款系列文创俘获了观展人群的心，部分款式上架就断货。在前不久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国博推出的孝端皇后凤冠冰淇淋、闹蛾扑花冰箱贴与慕斯蛋糕等，再次萌趣出圈……或许不久之后，国博又会迎来下一个爆款。

贾晓燕

清代 梁高
《观榜图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看榜去 古人的“查分日”

每年高考季后，总有许多人睡得很晚。等待高考成绩这段时间，有时感觉甚至比考试本身漫长。然而，这样的夜晚，中国人其实早已经历了上千年。

今天，我们把它叫作“查分”；古人则说：“看榜去”。

一张榜单牵动的，不仅是一场考试的结果，更是一代代中国人对于命运与人生际遇的想象。

雁塔题名 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朝进士科被视为“天下第一科”，举子们不远千里，齐聚长安应试。唐朝一度在秋天开考，次年春天才公布考试成绩。对于那些外地考生而言，既已千里迢迢来到京城，自然不愿轻易离开；而榜单未出，又无人能够真正安心。

来自福建晋江的欧阳詹就属于此类。从福建到长安，在唐代，这是一场跨越山川河流的漫长跋涉。欧阳詹客居长安六年，生活清苦，潜心备考，最后终于在贞元八年(792年)的考试中位列前茅，与韩愈同榜登科，成为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

而在后世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称的韩愈，其实也“复读”过多次。曾经落榜后，韩愈在长安居无定所，饥寒交迫，在《出门》诗中悲凉地写道：“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他的坚持在第四次得到了回报，与欧阳詹同科高中。

士子上榜后的快意之诗，最著名的或许要数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贞元十二年(796年)，四十六岁的孟郊终于考中进士，挥笔写下此诗，欣喜若狂之情跃然纸上。千百年来，人们反复吟诵这两句诗，却忽略了诗人此前的奔波与数次落第。除了脍炙人口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孟郊还有一首诗描绘了自己“看榜”时的欣喜：“幽意独沉时，震雷忽相及。”(《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座主吕侍郎》)此前已被屡屡失败折磨得麻木，及第的消息，真像是一声报喜的春雷了。

与孟郊、韩愈等人相比，白居易要幸运一些。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顺利通过宣州府的解试，获得了到长安参加考试的资格。唐代的科举考试规则尚不完善，未在科举中建立糊名与誊录制度。举子们为了上榜，往往以诗文为贵，冠以姓名入籍，拜谒文坛名宿以求汲引，希冀达于主司，这就是所谓的科场“行卷”之风。白居易在长安一边应试，一边奔走于权贵文人之间，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好在，次年白居易就登进士第。放榜后，新科进士照例前往慈恩寺塔(即大雁塔)题名。俗语道“三十老明经，五十进士上”，白居易二十八岁便已登第，在同榜题名的十七人中年龄最轻，意气风发。多年后，他回忆此事，仍带着骄傲之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李贺便是其中之一。他本欲参加进士考试，却因父亲名“晋肃”，有人认为“晋”与“进”音近，犯了所谓“嫌名”，因而不能进入进士试。韩愈专门写下《讳辩》为他辩护，只是仍无济于事。最终，这位后来以“黑云压城城欲摧”和“雄鸡一声天下白”惊动文坛、被称为“诗鬼”的天才，终生未能进入进士榜。

榜下捉婿 满城争说新进士

宋代科举规模扩大，取士人数也较唐代增多。除开封、临安这样的都城，本外地士人、商贩、旅客云集之地。科举考试前后，就是举子入京，赁屋寄宿，往来于贡院、客舍、酒楼、茶肆之间。榜未出时，他们等消息；榜一出，整座都市也跟着热闹起来。

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贡举。这一科后来被称为“千年龙虎榜”，因为榜单之上出现了苏轼、苏辙、曾巩、章惇等一批后来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二十二岁的苏轼与十九岁的苏辙同时登第。兄弟二人自蜀中入京，一路舟车劳顿，而今双双题名。这场放榜，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段著名佳话。

不过，对于宋代人来说，放榜的意义并不止于功名。榜单刚刚张出，豪门贵族往往格外关注新科进士的年龄与婚配情况，一场比考试更热闹的“榜下捉婿”活动随即开始了。

朱或《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

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其情形与其说是择婿，不如说是争抢，富商之家更是以厚财相诱。与唐代“雁塔题名”的文人雅趣相比，这明显更世俗、更热闹，也更真实。福建省邵武市博物馆藏的宋代银鎏金魁星盘盏，就形象展露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民俗心态。盘盏图案的主题“魁星”，后人附会它能主文运。盘心刻有词一首：

足踏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道[到]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级[对]。

宴罢琼林，醉游花市，这回好个风流婿。

这股风气，连宰相也不例外。宋真宗时，范令孙刚登甲科，宰相王旦便将女儿许配于他；新科进士高清，才具平平，宰相寇准却将侄女嫁给他，寇女去世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续弦，时人笑称这类幸运儿为“天子门生宰相婿”。

不过，并非人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好运”。宋代洪皓二十七岁就高中进士，又长得仪表堂堂，权臣王黼与朱勔都看中了他，并许以显贵前程。但洪皓并不想加入党派的互相倾轧，面对送上门来的富贵与姻嫁，他保持冷静，均予辞谢。后来洪皓接过了使节重任，出使金国，成为南宋著名的忠臣。

宋代的看榜日，有人欢呼雀跃，有人黯然神伤，还有人在人群中被迫陌生人拉住衣袖，懵然间，便已成了某家的乘龙快婿。

一声“中了” 报子飞奔传喜讯

到了明清，放榜的热闹又有了新的模样。许多人甚至来不及亲自去看榜。榜单刚刚张出，便有人飞奔而来，将消息送到门前。这些人被称为“报录人”，也叫“报子”。他们提前守候在榜前，一见榜单公布，便根据榜上的姓名，籍贯寻找上榜者住处，奔赴客店、会馆或寓所报喜。报子通常不止一人，有的骑马驰报，有的高举彩旗、旌幢，伴以鼓吹，一路热闹而来。报得越快，赏钱越丰厚，因此人人争先恐后。

明清时，捷报已有专用印版，印好后直接填上被录取学子的姓名、名次等即可。捷报送到门前，贴在门首，任邻里街坊争相观看。

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最著名的一幕，便发生在这个时刻。五十多岁的范进，直到报录人飞跑而来，高声喊道“中了”，才从浑浑噩噩中猛然惊醒。随后拍胸大笑，一头栽倒，醒来又疯疯癫癫地满街乱跑，最终靠岳父胡屠户一巴掌打醒。小说固然有夸张成分，但“范进中举”之所以流传至今，除了辛辣讽刺以外，它也写出了无数读书人面对榜单时的真实心情——多年寒窗，一朝得偿，巨大的喜悦往往令人失态。

现实中的场面，同样充满戏剧性。清末探花商衍灏，是亲历科举最后一科的见证者。据他回忆，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殿试，由于当时的榜眼与探花均为广东人，令北京的粤东会馆大大热闹了一番。在“骑马游金街”等官方仪式结束，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灏送状元刘春霖至直隶会馆归第后，一同归第粤东会馆，会馆预备了演戏宴客事宜，同乡在京任官者皆有到场。宴会热闹非凡，宴后盘碗杯箸更被民众抢夺一空，瓷器堕地声，笑话喧哗声，一片纷乱。这是中国科举时代最后一次放榜狂欢。次年科举废除，然而，学子等待成绩、期待佳音的心情，却从未消失。

榜单之外 人生何处无开始

十九岁时，山东淄川的蒲松龄参加童子试，连中县、府、道三试第一，名动一时。主考官闻章称赞他“观书如月，运笔如风”，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然而此后四十余年，他一次次走进考场，又一次次失望而归。直到七十余岁时，才以贡生的身份获得一个象征性的功名。如果只看榜单，蒲松龄无疑是失败者。可正是在那些漫长的失意岁月里，他写下了《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一生未能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可也正因为身处科举场外，他才得以冷眼旁观，将那些候榜、看榜、报榜的悲欢离合写进《儒林外史》，为后世留下了一幅最生动的“科举世相图”。

甚至连晚清名臣左宗棠，中举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不第，最终没有考中进士。然而后来收复新疆、兴办洋务、筹划边防的，却正是这位榜单之外的人物。

一纸榜单固然重要，它承载着寒窗苦读的期待，也记录着人生某一阶段的努力与收获。但榜单记录的，终究只是某一时刻的评判；而人生书写的，往往远不止于此。在这之后，属于每个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路宗